

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 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编者按：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指示。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重任在肩、使命在身。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立足于近现代以来西方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难以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此同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大国外交实践丰富多彩、成就斐然，但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话语、概念的遮蔽下，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经验却长期处于理论失语困境，难以凝练、升华为自主的理论体系。中国宏大、独特和丰富的外交实践为构建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实践导向也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要指引。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本刊约请四位知名专家围绕“中国外交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主题展开研讨，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进而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实践导向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

高 飞

(外交学院院长、教授)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出现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

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然而，长期以来，用以解释世界、指导实践的国际关系理论却主要来自西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大使命。在此进程中，“实践导向”成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突破口和根本方法论。

一、构建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是推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客观需要

自 20 世纪“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国际关系研究始终围绕着如何解释国家的行为模式而展开。从结构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新之争’，再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足鼎立”，^①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兴盛始终与美国霸权的崛起相互呼应，很多论者甚至一度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社会科学”。^② 尽管以赫德利·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对此强烈反对，认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不重历史、不讲思辨的方法会将国际关系研究引入歧途，^③ 但多年来，美国学界独霸国际关系研究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理论是社会经验的产物，社会实践和互动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社会意义的差异，因而，具有鲜明地域文化胎记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普适的适配性。这就客观要求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立足本土经验，探索建构自主研究范式和重构国际关系研究逻辑。2016 年 5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④ 这一重要论断启示中国学者应充分利用历史与当代的丰富外交实践，构建能够解释人类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

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明显的实践缺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倾向于构建静态的结构化分析路径，强调结构决定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却对真实世界中的动态实践关注不足。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性系统，社会性主体间的互动不

① 朱立群、聂文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实践转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 年第 8 期，第 99 页。

② 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Der 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16.

③ 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1966, pp. 366, 376-377.

④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是在一个静态的结构中展开，而是具有非线性和即时性特征。若忽视人类实践活动的丰富性、历史性和不确定性，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体系，西方理论范式不断呈现出“失范”状态，在一定程度上看，当今世界大变局也是西方理论范式危机的集中体现。一些西方学者也意识到，主要问题在于“理论研究者远离和漠视社会实践，将自身置于社会‘真空’中，通过高高在上或后视性视角观察社会现象，构思理念，阐述理论和表象知识，造成的结果就是科学家从象牙塔中看到的世界与实践者身处的世界相差甚远”。^① 国家间交往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单一理论和静态的单一因果逻辑难以解释动态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论本身需要不断从实践中发展和创新。例如，冷战结束之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人类治理理念的最终形态，^② 但世界并未如其所愿走向“历史的终结”，反而是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等社会运动，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更呈现出明显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倾向，而与之相对照的是，中国反而积极拥抱、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又如，制度主义认为，主权国家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彼此的结构性关联是不可避免的，跨国性议题的增加必然会导致国际组织与政府间组织的产生，^③ 而这些机构又能居中协调利益分配，促进国家间的信任与合作。^④ 按照制度主义的逻辑，随着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大国之间较难发生武力冲突与全面战略竞争，然而现实却是，当前地缘政治博弈正催生“相互依赖武器化”现象，即国家间相互连接、联系紧密的议题领域，反而变成了彼此伤害的工具和打压对手的武器。^⑤ 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治理赤字扩大等复杂现状超出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范围。可以说，在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所谓的“结构-施动者”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充满矛盾的建构过程，在当下偶然性频发的情境中，西方普适性经验并不适用。

与西方理论的实践缺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验长期面临理论失语困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在融入国际体系的同时保持自身特色的大国发展道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一带一路”

①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2, No. 2, 2008, p. 261.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 4.

③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Survival*, Vol. 15, No. 4, 1973, pp. 160, 162.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Lisa L.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p. 45.

⑤ 张宇燕等：《特朗普回归与中美关系新动向》，《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5年第3期，第12页。

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表明，中国外交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由于中国国际关系一般性理论建构长期缺位，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中国外交实践往往被套用西方概念加以解释。例如，自由主义理论强调“民主和平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据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被视为西方民主的另类，在西方话语框架下，中国被视为“规则的修正者”和“秩序的挑战者”。又如，依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主权国家主要“基于权力追求利益”。在这一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被套用于“国强必霸”逻辑，中国的崛起被解释为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破坏，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当代国际关系演化进程中，2000 多年前古希腊的“修昔底德陷阱”仍具有必然性。一方面，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阻碍了西方去理解并学习其他文明的逻辑、智慧、价值观及其成就，导致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知识逐渐陷入贫瘠；另一方面，缺乏自主、自洽的理论和话语体系，也使中国外交所倡导的伙伴关系经常被描述为“军事结盟”，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被抹黑为“债务陷阱外交”，履行大国责任和参与全球治理被曲解为“争夺领导权”。这不仅容易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认知偏差和战略误判，更使中国无法获得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当前，中国已走向世界，中国学正走向全球。构建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是时代所需、历史必然。这不仅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更具解释力与前瞻性的理论支撑，更能超越零和博弈与霸权稳定的传统逻辑，为解决全球发展、安全与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这既是中华文明为应对全球性挑战、重塑世界和平与发展范式所做出的原创性知识贡献，亦是通过掌握国际话语定义权、提升制度性权力，从而为中国在全球化新阶段的和平发展赢得更大战略主动与历史性机遇夯实学理根基。

二、“实践导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结合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①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破解国际体系中秩序演进的难题需要确立“实践导向”的研究范式。

“实践导向”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思想传统中最具生命力的核心特质。中国古代思想蕴含着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传统。儒家思想

^① 马占成：《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30 日，第 1 版。

历来主张学以致用，将个人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紧密结合，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孟子也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同样彰显了知识分子心怀天下、造福百姓的实践品格。荀子明确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荀子·儒效》），将“行”置于认识的最高阶段。法家思想则更加强调实际的治理效果，如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史记·商君列传》），以实践效果作为衡量政策优劣的标准。韩非子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韩非子·奸劫弑臣》），强调通过实际验证来判断是非对错。明代王阳明在《传习录·卷上》中进一步提出了“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认知逻辑，成为后世遵从“重实践、尚实干”的思想经典。

“实践导向”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客观要求与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马克思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原理，^②倡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方式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文化传统的结合。步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旨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体系，更是引领新征程、推动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的根本行动指南。

“实践导向”还是梳理中国外交发展路径、推动理论建构的资源宝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通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胁妄图扼杀新政权，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以非凡的勇气，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政策，^③彻底摧毁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提出并倡导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为指导国家间关系互动的基本准则。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刚刚独立的亚非拉民族国家迅速建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8页。

③ 参见刘华秋：《中国百年外交的启示》，《求是》，2001年第1期，第40页。

立了外交关系，奠定了新时期外交的基础。20 世纪 60 年代，面对美苏两霸同时施压的险恶外部环境，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强调中国应团结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经济落后地区在内的第一中间地带力量，积极争取西欧、日本等第二中间地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决捍卫国家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使中国逐步发展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为应对苏联霸权主义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构想，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本主义国家是第二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是第三世界，并据此推动实施“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布局，为中国外交方针调整以及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政策的彻底失败，此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或提升了外交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论断，更加完整地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做出了“不结盟”的决策，强调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以此为基础，中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做出国家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科学判断，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融入国际体系。2001 年 12 月，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全面提速。2010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迅速扩大。这些丰富的外交实践，为发展中国自主国际关系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实践导向”是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基础构筑 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路径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实践回答；新型国际关系是对大国交往能否超越零和博弈的现实探索；“四大全球倡议”则是弥合全球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具体方案。这些理念都是从中国外交面对的现实问题出发，在实践中生成、检验并不断丰富完善。习近平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必须坚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用实践来实

现真理、检验真理。”^① 以实践作为认识起点与检验标准的理论导向，构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认识论、方法论自觉，也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确立了根本路径。

近年来，反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实践转向”进程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实践性逻辑概念强调国家行为的驱动因素来自于行为体在长期交往中积累的实践感知和共识。^② 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场域系统，其中包含外交场域、安全场域、经济场域等多个相互重叠的子场域。^③ 安全合作不仅是国家间的政治问题，更是一个由跨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组成的场域，这些组织通过竞争象征资本来构建知识性权威，从而影响安全政策制定。^④ 这些理论研究均揭示出实践本身就是国际关系知识最重要的来源，但我们仍需看到，“实践转向”的经验大多源于西方国家的外交案例，尚未充分吸纳非西方国家的历史资源和实践智慧。当今世界，中国的崛起已是一个产生重要理论的重大事件。^⑤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高效的现代治理体系，以及中国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逻辑，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没有被世界充分理解，而这也正是中国学者从国情出发实现理论创新的窗口期、机遇期。

按照“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范式，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中国经验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中层理论，进而构建知识体系。立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外交的实际，以实践为导向的学术体系构建，首先需要解决两个认识前提问题：其一是重新界定国际关系的本质。中国外交的经验表明，国际秩序不是由权力分配或制度框架决定的结构，而是行为体在具体情境中互动和建构的关系过程。从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到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中国外交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是在回应具体挑战中的创造性实践。因此，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仅停留于通过结构还原方法确立因果关系，而要把重点放在国际关系的“塑造”问题上，关注外交的进程，从而更好地发挥人的能动和建构作用，回到行为体“做什么”和“如何做”的实践场域。其二是重新确立理论普适性的判断标准。既

① 习近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求是》，2023年第20期，第8页。

② Vincent Pouliot, “The Logic of Practicality: A Theory of Practice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pp. 273-274.

③ Rebecca Adler-Nissen, “Bourdi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in IR,” in Rebecca Adler-Nissen, ed., *Bourdieu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outledge, 2012, pp. 11-14.

④ Didier Bigo, “Pierre Bourdieu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wer of Practices, Practices of Pow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Vol. 5, No. 3, 2011, pp. 249-252.

⑤ Pan Chengxin and Emilian Kavalski, “Theorizing China’s Rise in and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8, No. 3, 2018, pp. 292-294.

然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关系过程，那么，理论的价值就不在于形式上的简约精密，而在于解释和指导实践的能力。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这是破解百年变局的国际关系公理，理论的普适性需要在国家安全是否得到维护、国家发展是否得到促进、世界和平是否得到捍卫的外交实践中加以检验，其最终目标则指向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外交实践遵循以意义共建和关系塑造为核心的方法论。换言之，国际合作的推进不依赖于权力驱动或制度性约束，而是在务实的沟通行动中形成各方共同认可的意义结构和良性关系，进而推动国际社会走向协商共建。例如，“四大全球倡议”围绕发展、安全、文明等议题提出新的话语叙事，将“沟通理性”引入合作治理框架，通过意义间的符号互动推动各方形成共同的认知基础；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倡导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交往原则，在国家间培育相互承认、相互依存的主体间关系，弱化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立所固化的“敌对他者”认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平台和多边对话机制则为各方搭建了公共交往空间，使共识的达成是各方在开放空间中持续互动的产物。新时代中国外交已提供了充分的经验支撑，关于外交实践的政策研究也形成较为丰富的文献积累，学界更应在现象性描述中探究方法路径，实现从自主知识体系到中国国际关系学术体系的发展演进。

结 语

当前，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关系现象解释和预测力不足，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丧失，西方主导国际关系话语权的事实也日益受到质疑。过去 30 多年里，世界形势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却呈现出停滞态势，既没能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做出有力的解释，也未能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变做出清晰预判。2013 年，《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杂志就以专刊形式惊呼“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①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理论本身并未走向终结，但学科内对“何为理论”缺乏共识，现实世界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事件来挑战经典范式关于“理性-施动性”的本体论假设。因而，学界更应回归现象解释的本源，从实践维度来重新思考理论建构路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表明，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又指引伟大实践。只要中国学者坚持以实践为导向构建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

^① Time Dunne, Lene Hansen and Colin Wight, “The En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3, 2013, p. 418.

体系，就一定能够形成解释中国、理解世界、引领未来的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经世致用精神的传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践行，从而以高度的理论自信与文化自觉，为破解时代之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强有力的知识支撑。

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理论、方法与体系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无论就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还是实践行动来说，在中国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国际关系学可谓是走在最前列的少数几个学科之一，堪称排头兵和先行者。早在1987年于上海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发出了构建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倡议；自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构建问题，先后提出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发展、天下体系、关系理论、边缘地带发展论、道义理论、共生理论等理论创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积极从国际关系和外交学视角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体系化和学理化阐释，在研究、阐释、对外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方面，不断守正创新，在国际交流中展现出中国学者自信、自立的群体精神气象；中国高校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点为国家自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土国际关系学者；30多年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初心不改，至今累计推出40多种原创性国际政治著作；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一流期刊方阵实现整体性崛起，一批选题和论文质量均居于世界前沿水平；近些年来，在新增的国家安全学和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建设中，国际关系学者也成为这两个一级交叉学科建设的主力军。

一、来自中国的国际关系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

一门学科的成熟，标志之一就是有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标识性概念体系，从而构成解释、分析并可指导实践的知识图谱。国际关系学科主要是研究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门学问，各国在长期互动实践中积累而成本

学科一些共同的概念和范畴，其中，有的国家贡献较多，有的国家贡献少一点。那些对国际关系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国家，其认识国际关系的思想理念、运筹国际关系的政策和实践，会更多地影响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体系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70 多年来，中国对外关系实践逐渐形成了由诸多标识性概念构成的观察、分析、指导国际关系现实的话语和思想体系，这些标识性概念的基础要义及其内涵不断延伸，构成了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指引国际关系实践的知识图谱，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中间地带、反帝反殖反霸、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新型义利观、共享发展、结伴不结盟、新安全观、文明多元共生、共商共建共享、统筹两个大局、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关系民主化、要公道不要霸道、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这些标识性概念不仅见于官方外交话语和学术研究，甚至极为自然且潜移默化地流行于普通中国人对世界的表达中，它们迥然有别于西方政界、学界和媒体界推崇的实力、交易、联盟、势力范围、地缘政治、文明-野蛮、自由-专制、民主-威权、文明冲突、优越论、武力优先等国际关系话语体系。

在学科知识图谱中，标识性概念的意义不只是一个名词，更重要的是，其具有分析和扩展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知识可以不断被加工和生产。在《资本论》一书面世之前，“资本”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是《资本论》通过分析资本的运动规律而揭示了剩余价值，从而使得“资本”一词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标识性概念。与此同时，一门学科中的诸多标识性概念，在逻辑关系层面往往相互联系，它们彼此支撑、互相依赖，从而构成一套学科知识体系。上述列举的中国国际关系知识图谱中的标识性概念，相互之间具有很强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了中国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及指导外交实践的认知基础。由此，在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比较中，它显示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和风格。例如，就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这一共同体的文明内涵是通过全球文明倡议来体现的。针对全球文明间关系问题，国际社会既存在文明冲突论，也有文明多元共生论。从认识论角度看，当人们假设真（文明）的对立面一定是假（野蛮）的话，在实践层面，自然会产生用“真”去改造“假”的冲动，这一认知表现于文明间关系层面，就会产生文明冲突论的理念和实践。但是，当人们假设真（文明）的对立面可能是另外一种真（文明）的时候，那么，文明和文明之间就具备了对话、交流和互鉴的前提、可能与机会，由此，便自然产生文明多元共生的理念和实

践。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文明多元共生、全球文明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标识性概念，实际上存在很强的逻辑连贯性。

此外，新型义利观、共建“一带一路”、和平发展、共享发展、全球发展倡议等这些标识性概念，在中国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中也存在很强的逻辑连贯性和一致性，它们显著区别并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中西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存在对利益以及如何增进利益的本质性认知差异：或认为增进自身利益应基于别国利益实现的前提，或认为自身利益的实现不应减少别国获利的状态，或认为实现自身利益须以损害别国利益为代价，在实践中，这些认识显然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能建立在新型义利观也就是关联利益基础上，其不可能建立于利益可以绝对分割或者单独实现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国际社会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的模式：其一，一国的发展建立在同别国共同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这是和平发展的经济模式；其二，一国的发展既没有增进别国利益也没有产生损害；其三，一国的发展建立在掠夺、损害别国利益基础上，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国际关系现实中，这三种发展模式都可以找到对应实践。基于国际关系中利益及其增进方式的不同认知分析，我们就能理解新型义利观、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等标识性概念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中国遵循利益实现及其增进的这种共享方式，在任何人类社会包括西方社会内部，这种共享模式也都存在，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才产生了按照新型义利观推进国际合作和发展的共同基础。换言之，那些认识并尊重以共享方式实现利益及其增进规律的国家，而非固守于不断损害别国利益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国家，最有可能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上发挥引领作用。

二、两个结合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创新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基本遵循，国际关系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不例外。结合思维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汉语中的结合有一个重要含义，即将一种普遍性原理同具体实际结合，并在结合中持续比较、纠正、转化，从而不断增生和创造新事物。转化则是指事物形态、结构或性质从一种状态转化为另外一种状态。

在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创新中，在结合与转化过程中，有两点比较重要：其一，始终要将主体性摆在首要位置。在坚持主体性基础上，把

他人的优点加以消化吸收，从而转化为自己的好东西。其二，实现有效、有用转化的前提是掌握事物的客观原理和运行逻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对外关系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成果，分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在当前阶段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同西方资本主义霸权式国际关系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也体现了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及其规律的思想，揭示了人类从生产到解放的过程。这个基本原理结合到国际关系具体领域，就是要在理论上回答国际社会的性质及其所处发展阶段（时代）的特征和任务。西方经典国际关系理论假定国际社会的性质是无政府状态，这个假定进一步为权力政治、掠夺政治的合法化提供了基本学说前提。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其变体自由主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基本都是从关于国际社会性质的这一基本假定演化而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理根基在于其国家学说。国家是人类政治的一项伟大发明，进入国家状态的人们便进入政治秩序构建阶段；人类各个社会群体进入国家状态有先后之分，渐次进入国家状态的国家彼此之间逐步发展出国际关系，进而形成完整的国际社会，其标志是主权国家体系的定型；组成国际社会的国家，其性质、制度和道路是迥然不同的；国际社会的性质以及阶段性主要矛盾，仍然表现为建立有利于各国、各方共同发展的公道、民主、平等的国际秩序，同维护霸权等级压迫的旧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以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实践为进一步构建公道、民主、平等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政治条件，在国际社会这个新的发展阶段，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开始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主权国家体系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解决全球性问题就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而这便同西方流行的对抗式国内政治安排形成了结构性冲突。

中国把针对上述国际关系历史发展的一些普遍性和阶段性特点的认识，结合、转化到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并对此进行还原和提炼，形成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内涵：对组成国际社会成员差异性的认识和尊重，自然产生了和平共处的思想；意识到我们已进入主权国家体系定型的全面国际关系时代，便将捍卫主权原则视为构建国际秩序的基石；面对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实践矛盾，提出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为开展新型外交的支撑；根据自身对国际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的判断，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并制定相应的外交战略。由此可见，当我们讨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时候，这个“特色”不是特殊的、与普遍相对立的，它本身就具有普遍意义。这是因为，其是在将关于国际社会性质和发

展阶段的普遍性规律运用于指导自身外交实践中，用民族特色的概念和话语表达出的普适国际关系思想。

三、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方法论

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共享一些研究工具，例如观察、实验、调查、统计、比较、推理等，这些方法都是古今中外知识生产必须遵循的科学要求，各国无一例外。但是人们应注意到，各民族的文化和哲学思维方式差异，从而深刻影响其对于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选择。中华民族在处理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时，就强调矛盾、系统、关系、平衡、中道、轻重等独特方法。有学者认为，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人类广为接受的共性科学方法，故而知识体系没有中西之别。但是这一论断有一半是对的，而另一半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其混淆了方法和方法论。从工具意义角度看，任何一套知识体系所依赖的观察、实验、调查、统计、比较、推理等方法相似的，但是，从方法论意义角度看，各国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过程、思路和目的的方法论则是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论、系统论、实践论、实事求是、时代特征等，既是社会科学研究也是治理实践中方法论维度的重要方法。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研究者是运用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方法，还是采纳资本至上的倾向和态度，则决定了政策和治理的初衷、目的以及最终效果如何。

对时代特征的分析以及在时代特征科学分析基础上做出战略和政策选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之一。党的创新外交理论极为重视对中国发展所处阶段、面临国际环境、国际社会所处阶段的分析和判断，并将其作为制定正确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科学依据。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所处的国际环境。换句话说，对任何国家而言，国际关系总体状态及其演变方向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决策者不可不深察。一国特别是大国，在国际关系中行事可谓如履薄冰，在这个问题上若误判错判，且不论会错失发展机遇，世界历史中引发灭国之灾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近代历史上，法西斯国家倒行逆施，给他国造成深重灾难，自身最终也沦落到几近亡国的境地；当今世界，霸权国信奉强权政治逻辑、试图一手遮天，逆世界潮流而动，部分原因是其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对历史大势和时代特征判断有误。70多年来，中国始终站在世界历史正确发展方向的一边，时刻掌握历史的主动，这源于我们对世界大势和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和阶段特征的科学认识和精准把握。

注重对世界大势和时代特征的研判，并据此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这体现了将国际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概言之，随着主权国家体系的定型、生产的国际化以及世界互联互通的深化，国际关系各个部分按照某种组织原则和规范、规则越来越结合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系统，进而产生内在规律性的运动；体系内各国若要开展以及拓展对外关系实践，则日益需要掌握和把握其运行规律，而不能置身其外。从这个角度看，“国际关系”概念就不是简单的国家间双边或多边关系总和，因此，我们更要重视对其得以组织起来成为体系的价值、规则、机制、组织等因素进行研究。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进入新时代以来经常提到的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国内与国际两类规则，以及构建以中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等外交话语。当然，从学理角度看，中国学者需要格外重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领域存在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互动对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意义，而这也可能是 21 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界可能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个领域。

四、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化和体系化构建

对实践进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是理论思维能力的体现。和平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在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创造的一个奇迹。接下来，我们将以和平发展国际关系实践的学理化、体系化为例来说明理论建构在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意义。对和平发展理论的概括，学理上大致应遵循以下几个思考步骤：第一，探究《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性质。从《党章》和《宪法》及其历次修订中可以探寻中国对正义事业的定义和坚持。《党章》有助于我们认识政党的性质，《宪法》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的性质。第二，分析中国的制度体系。仅依据第一点，我们还不能认定一个国家必然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因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或宪法不将对外追求和平作为政策宣示要点。因此，我们还应该考虑中国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考察中国的国家制度体系及其运行如何有利于确保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走和平发展道路。或者说，在 70 多年的时间中，我们需要研判中国的制度体系有没有或者有多少次拒止了选择发动对外战争的案例。第三，考察和平发展政策体系。虽然人们并不能直观地观察国家的行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实施的政策来观察其行为和背后的动机。在国际关系中，若一国政策无意或有意持续地损害他国正当的权益，则必然会在对外关系领域

引发反弹或者反制，从而容易酿成外交冲突。据此，我们要从以下几个维度观察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体系：其一，考察中国是不是在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未损害他国的利益，或者在提升自身发展水平的同时，别国也能相应得以发展。通过这个观察角度，我们最能看出和平发展是不是内生于中国的政策体系之中；其二，在这一分析基础上，寻找中国选择这种政策的制度根源所在；其三，分析中国化解矛盾的方式。研究者可以观察中国在国内最困难或矛盾集中爆发时期是否将对外扩张作为重要的政策选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预测，国家在遇到严峻国内矛盾和难题时，便具有对外发动战争以转嫁国内矛盾的动机。但是，中国的政策选择和对外行为显然不是如此，中国在碰到矛盾或者遇到难题时，更倾向于通过内部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而不会对外发动战争来转嫁内部危机。

综合以上观察要点，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出现内部矛盾和压力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并不倾向于采取对外扩张或者转嫁危机的政策，而是尽力通过内部制度创新方式来化解矛盾和压力。从学理角度来说，即政策的最小负外部性和非排他性，可以作为我们定义国际社会负责任国家的一个标准。所谓最小负外部性，就是国内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将潜在的国际关系消极影响以及他国的合理、正当关切纳入评估之中；所谓非排他性，就是政策制定应兼容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而非以排他性集团或针对第三方作为政策出发点。

从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角度看，和平发展论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普遍意义。这一理论建构并非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能够独立完成，需要政治学、宪法学学科的支撑，也需要涉外法学、政策学（外交政策体系）研究者的加入，更需要打通并融合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新方法，从中国制度体系以及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的互动维度展开深入研究。

结 语

改革开放以来，在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升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新型大国地位进程中，国际关系的学科、学人、学问不断茁壮成长。本文简要回顾和总结了这一学术自觉现象，并对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规律性问题进行梳理和展望，希望对增加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骨气、鼓舞国际关系学界的士气、增强国际关系学界的志气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当今世界处于一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口，国际秩序构建正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如何从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角度对国际秩序演进方向进行谋划，

或者通过国际秩序的表达和实践推进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或许是未来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发展成熟的重要推动力。

正确义利观与中国经济外交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李向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正确义利观是习近平主席在继承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治理的变革方向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践需要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论断，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它超越了西方经济外交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内在的统一性。同时，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也证明了正确义利观的可操作性。因而，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的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成了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正确义利观的缘起

正确义利观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核心要义是以义为先、义利并举。

自孔孟时代开始，义利观就是儒家道德伦理和价值体系的核心命题，也是历代先贤关注的一个持久不衰议题。在儒家文化中，对个人而言，它是道德修养标准；对国家来说，它是治国理政理念。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传统义利观关注三个核心议题：其一是义和利的界定；其二是义和利的主体；其三是义和利的关系。与先秦时期强调以义制利、以义节利相比，现代意义上的义利观更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和辩证统一关系。从传统的个体伦理与治国理念升级为指导国家经济外交的思想指南，正确义利观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飞跃。

正确义利观的另一个来源是新中国的经济外交实践。按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来划分，过去 70 余年，经济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跨越 1949—1978 年，属于“站起来”阶段。受西方国家封锁与中苏关系破裂的制约，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导向是经济服务于外交。1971 年 10 月，第 26 届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经济

外交取得的突出成就。但由于受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影响，当时过度强调经济为外交服务，客观上忽视了经济利益，致使以对外援助为主体的经济外交陷入了经济上不可持续的境地。第二阶段跨越 1978（改革开放）—2012 年（党的十八大），属于“富起来”阶段。在这一阶段，外交服务于改革开放成为基本导向，这突出表现为 1995 年开始实施的“经贸大战略”。它把单一的对外援助与对外贸易、资本流动结合在一起，扩大了经济外交的内容、范围及可动员的资源。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经济外交的变化还表现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与经济全球化。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过度强调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客观上造成了中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失衡。第三阶段为 2012 年至今，属于“强起来”阶段。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需要构建经济与外交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关系与机制，克服此前过度强调经济为外交服务和外交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倾向。由此可见，以义为先、义利并举的正确义利观是我们党在经济外交实践中不断完善、逐渐形成的重要理论创新。

二、基于正确义利观的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构建

经济外交的本质是主权国家以经济工具为手段、以对外战略利益为目标的对外交往实践，以正确义利观为原则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也必然要围绕这一框架展开。从经济外交学科体系构建的角度看，把正确义利观理念贯穿始终至少需要回应下述问题。

第一，“义”和“利”的内涵界定。传统义利观更多是在道德伦理层面对“义”和“利”的内涵进行界定，而在经济外交领域，我们必须在主权国家间合作关系层面对其加以界定。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亲诚惠容、真实亲诚、共同发展等，都可归为“义”的范畴，其功能是提高了中国的软实力。“利”则反映的是国家间合作所带来的实际利益。互利共赢既是中国所追求的“利”的目标，也是“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正确义利观的实施主体及其价值追求目标。传统义利观是一种伦理理念，其行为主体是个人，而正确义利观是在市场机制下对主权国家的行为规范，其行为主体是政府与企业。两者的价值目标也是不同的：作为主权国家的代表，政府更多追求的是“义”的目标，而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则主要追求的是“利”的目标。只有两者追求的目标相统一，才能真正践行正确义利观。

第三，“义”和“利”的相互关系。“以义为先”体现了中国经济外交的

鲜明特征，而“义利并举”则是正确义利观具有可操作与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就两个实施主体而言，政府不能牺牲企业的经济利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去追求“义”的目标，因为这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为此，政府需要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去追求“义”的目标。

第四，正确义利观的实施机制。针对如何贯彻正确义利观，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其一，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统一。要求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其二，予和取的统一。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甚至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其三，构建正外部性。企业“走出去”既要重视投资利益，更要赢得好名声、好口碑。这些论断既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体现了“义利并举”的理念。

第五，贯彻正确义利观的实践平台。以正确义利观指导的中国经济外交并非空中楼阁。理论上，正确义利观所要求的多予少取、只予不取还对应着予取相等。在现实中，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三种经济合作形态：如果说只予不取对应的是对外援助、予取相等对应的是正常的商业合作，那么，多予少取对应的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经济合作模式，比如，以提供优惠贷款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就是一种典型例子。中国自 1995 年开始实施的“经贸大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都是涵盖上述三种形态的新型经济外交实践平台。

由此可见，正确义利观是基于新时代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求与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传统义利观的发展和完善。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让渡概念，而是规范中国与其他国家合作与利益分配的完整理论体系。正确义利观不仅规定了中国经济外交的基本理念和指导原则，而且还决定了中国经济外交中不同实施主体的行为目标、手段、载体与机制，从而构建起不同于西方经济外交思想的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外交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正确义利观对西方功利主义经济外交理念的超越

西方经济外交理论存在多种流派，但它们都服务于霸权国的基本行为逻辑，即以“价值观+胡萝卜与大棒”为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主义理论假定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国家首要目标是实现生存与权力的最大化，经济是国家获取霸权和实现相对利益的工具。其经济外交的逻辑是零和博弈思维，以经济作为权力工具追求本国的相对收益。自由主义理论假

定国家可以通过制度绑定实现互利共赢，其重视绝对收益，认为各国间相互依赖能够抑制冲突、塑造和平，自由主义经济外交的逻辑是通过搭建规则与确立秩序以降低交易成本。建构主义理论假定国家利益不是天然固定的，而是由观念、规范、身份认同加以建构，由此，话语和规则能定义国家经济利益的边界，其经济外交的逻辑是争夺国际经济话语权。

相比之下，正确义利观建立在共同发展的天下主义之上。所谓天下主义是以“天下”为整体秩序构建单位，超越狭隘的国家利益算计，追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政治哲学与世界秩序观。以义为先体现了大国在国际合作中的道义担当，而义利并举则反映了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因而，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这种意义上看，正确义利观是对西方功利主义经济外交理念的超越。

当然，在操作层面，秉承正确义利观构建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体系，仍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外交的部分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关于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假定、主权国家的行为与合作需要规则和机制进行规范、规避或缓解国际合作中由委托-代理关系所引发道德风险的路径等。

四、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实践

以正确义利观为基本理念的中国经济外交理论源于实践，同时也能够指导实践。过去十余年来，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共建“一带一路”上，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三大目标定位中，其中之一就是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顶层设计，另外两个目标分别是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正确义利观指导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缓解了世界市场失灵，确立“一带一路”倡议的公共产品属性。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领域的投资客观上存在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的特性，致使国际投资缺口长期存在，这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在主权国家境内，中央政府可以运用转移支付手段解决这一难题，但在国际市场上，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这一难题尚无有效的解决办法。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政府推动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的“硬联通”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选择，这就决定了“一带一路”倡议原初就具有国际公共产品属性。

第二，以推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构建廉洁丝绸之路为手段，促使企业注重长期收益目标。自2019年达成《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以来，中国

政府先后发布了《“一带一路”廉洁建设高级原则》《“一带一路”廉洁建设成效与展望》《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2025 年出台《企业境外履行社会责任工作指引》，并明确了命运与共、以义为先的指导原则。这些政策措施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企业海外投资“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第三，政府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引导企业“多予少取”，实现“义”和“利”的统一。国家在追求“义”的目标中不能以牺牲企业利益为代价，这就要求政府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引导企业服务于“义”的目标。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税收、融资、保险政策促进了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实现“义”和“利”的统一。

第四，促进正常商业合作、对外援助与让利合作模式的有机结合，构建合作机制的正外部性。对外援助是一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对外援助强调所谓的独立性与透明性，但实践证明，其并没有达到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而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正常商业合作、对外援助与让利合作的有机结合提高了对外援助的成效，实现了“授人以渔”的目标，客观上发挥了“1+1+1>3”的功效。此外，通过构建“绿色丝绸之路”，中国政府还鼓励中资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投资着重向清洁能源领域倾斜，并承诺全面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此举提高了共建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客观上也发挥了合作的正外部性功能。

五、构建中国经济外交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方向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引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外交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遵循一系列基本原则：其一是理论层面的自洽性。理论自洽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从作为道德规范的传统义利观到作为国家间合作规范的正确义利观是一个巨大的理论飞跃，这就需要对基本概念做明确的界定，确立简约、符合实际的前提假定，以保持理论判断的逻辑统一。其二是操作层面的可行性。经济外交是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理论本身不仅要能解释现实，而且还要能够指导实践。政策层面的可操作性是对理论的基本要求，若缺少这一点，理论构建就是失败的。其三是认知层面的国内外统一性。外交关注的核心是国家间关系，经济外交也不例外。中国经济外交理念为国际社会接受的必要条件是国内外认知的统一。这不仅要求我们对经济外交理念的对内表述与对外表述相一致，而且还要让外部世界相信中国表述的这种理念。

构建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引的中国经济外交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长期过程，未来，还有很多急迫的理论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其一，外交目标的“定价”（pricing）问题。以经济手段实现外交目标是经济外交的核心问题。为实现一项外交目标究竟应该投入多大的经济资源，这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外交学所能单独回答的。其二，经济手段与外交目标的转化效率问题。转化效率高意味着经济外交政策能够发挥事半功倍的效能，反之，则意味着效果事倍功半。其三，委托-代理关系所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大国与小国之间客观上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如何协调秉承正确义利观与降低道德风险的关系，已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四，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安全化日趋严重的国际环境，经济合作本身就成为一个（广义的）外交问题，经济与外交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其五，当经济合作的“压舱石”效应式微，经济外交的功能是否会相应减弱问题。此外，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纳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进程之中予以考虑。

知识创造与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文科资深教授）

“自主知识体系”这个概念包含了“自主”“知识”和“体系”三个构成要素。“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中国学界努力的目标，学界既往对于这个目标的讨论似乎侧重“自主”较多，而涉及“知识”或“知识体系”略少。例如，百度百科便如此界定“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中国实践，是知识有序组合的整体，能够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①这一界定给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创新设定了多项标准，然而，知识创新要符合这个定义中的所有标准是较为困难的，例如中国人创造的核武器知识、AI知识、外国语言知识以及欧洲史、非洲史、美洲史等研究都较难满足这些标准。作者以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自主”“知识”和“体系”是统一的整体，三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在此，作者仅就“自主”“知识”和“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谈谈管窥之见。

^①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百度网，<https://baike.baidu.com/item/中国自主知识体系/64999183>。

一、具体知识

虽然,“自主”是努力方向,但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功能是创建出具体的新知识。若创建不出具体的新知识,则既难有自主的知识,也不太可能有知识体系,当然就谈不上自主知识体系了。自主知识体系种类繁多,但形成的难易程度却有天壤之别。例如,个人的自主娱乐体系、自主学习体系以及自主锻炼体系,这类体系是相对容易建立的,然而,群体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科技体系、自主理论体系则是较难建立的。其原因在于,个人的自主体系构建所需要的知识有限,而群体的知识性体系建设则需要非常丰富的知识。故此,要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其重要实现路径在于创新出大量的具体知识。知识创新都是在研究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若不涉及具体问题的研究,学者们就难以创造出具体的新知识。这也是为何脱离了具体知识问题的会议和文章较多讨论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政治意义、基本原则,而产出不了重要的学科知识。

国际关系专业要创新知识需要针对当下涌现的具体国际问题,特别是聚焦尚无法解释的现象或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冷战后形成的全球化国际秩序已经转变为逆全球化秩序,虽然描述这种变化趋势的文章很多,但能够解释其为何转变且有说服力的分析却不多。当前,地缘政治学非常流行,但这种学说无法解释当下全球秩序的变化根源,甚至连特朗普改变拜登政府对外政策方向这种政策层面的现象也解释不了。此外,如今民粹主义兴起、自由主义衰败,但这种全球性政治思潮的变化并非首次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社会是以帝国主义思潮为主导,二战前法西斯主义盛行,二战后共产主义兴起,冷战中期民族主义遍布全球,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主导世界,而如今则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目前,基于结构主义范式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未能就国际政治思潮的兴起与衰败提供有效的解释。研究和创造解释这些真实国际问题的知识,才有可能建设新的知识体系。

作者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知识创新需要特别注意克服地缘政治学的负面影响。始于欧洲的地缘政治学在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讨论地缘政治学的著作和文章不断被发表,讲授地缘政治学的课程也很多,人们往往下意识地运用这种学说去解释国际关系现象,却不太注意这种学说的严重缺陷。一国政府决策者的变更引发双边关系恶化或改善是古今中外的普遍现象,例如,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与盟国关系恶化,美方甚至考虑退出北约。然而,地缘政治学却无法解释这种常见的重大国际变化,当下地缘政治学面临的国际关

系现实挑战，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当年“地心说”所面临的挑战。受地缘政治学影响，美国学者创建的结构主义理论也无法解释上述现象。“结构”是指相对持久、稳定的框架，稳定是结构的内在属性，这一属性决定了结构范式难以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变化。在分析既定时期内的国际问题时，结构经常是常量，常量不能解释变化是完全符合常理的。故而，如果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能够摆脱地缘政治学和结构主义范式的观念束缚，则有可能取得重要突破，创造出新的理论知识。

二、知识体系

体系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①人们对于哪些知识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有着不同的判断标准。如果我们将“知识体系”定义为逻辑自洽的知识系统，那么，该体系内相关联的知识就必须相辅相成、没有矛盾。例如，古典物理学、化学、形式逻辑学、数学等各自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都符合这个认识。然而，如果将“知识体系”界定为多种对立知识的集合体，那么，这种知识体系内的知识就不必有逻辑一致性。例如，人们通常将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视为两种不同的知识体系，这两者内部都包括了相互对立的知识。在这两个体系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争论、人性善与人性恶之争都长期存在。此外，当人们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视为两个知识体系时，还发现双方知识有很多的重叠之处。最常提及的一点是，在轴心时代，在双方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希腊哲学家与中国思想家们却拥有很多共识。

国际关系理论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学界有不同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的斯坦利·霍夫曼曾提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是“美国的社会科学”。这说明，他把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视为一个知识体系。如果我们也接受他的这个认知，则意味着知识体系可以由假定、逻辑和观点都相互对立的知识构成。我们看到，国际关系理论在70年代便已经形成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多种流派。有些学者则认为，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中国学派都不属于美国的社会科学。若秉持这种观点，则等于否认国际关系理论是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而是认为其由多个独立的知识体系构成。对知识体系的认知分歧也表现在有关中国学派的争论中。有些学者认为，凡是从中华文化视角创造的国际关系理论知识都应属于中国学派，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41页。

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学派的共性应以理论假定为基础而非基于文化出发点。概言之，目前学界对“知识体系”的标准认知不同，这可能要等到相互关联的知识形成某种体系后，大家才能形成共识。

以共同的假定作为知识体系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在同一个知识体系内，不同理论知识也会有分歧，但这种分歧应建立于共同假定之上。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例，就古典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新古典现实主义以及道义现实主义而言，虽然这些理论的自变量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假定都是国际体系是无序的、国家行为是利己的、国家利益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国家安全是自保的。依据假定的一致性，我们可视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流派均为同一知识体系内的知识。在基本假定上，建构主义则与现实主义相反。如果将建构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视为同一个知识体系，这就意味着一个知识体系可以是无限拓展的。当我们把所有对立的知识均纳入同一个知识体系时，则可能会出现悖论：任何一个知识体系的存在都是以该体系之外尚有无法纳入的知识为必要条件，如果一个知识体系可以容纳所有知识，即该体系之外没有其他知识了，那么，这些不同的知识是否构成了一个知识体系也就难以判断了。

由于知识体系是由众多相互联系的知识构成的，因此，其形成的过程具有很强的自然性，即知识创造者们根据他们各自的研究需要来创造具体知识，其中有些新知识是自然形成相互关联关系的。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理论知识的相关联程度似乎还不够高。当我们观察一下学术期刊文章中的引用情况，便可以发现，就相互批判和相互引用的数量而言，中国学者之间要少于美国学者之间，而中国学者批判和引用外国的研究成果似乎比批判和引用中国研究成果还多一些。这意味着，如果要使创新的知识之间产生相互关联的关系，中国学者需要关注相互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要改变不愿相互批判的习惯。从知识创新角度看，相互批判是形成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方法，因为相互批判就要讨论假定、逻辑、数据和案例的可靠性，于是，此举便能够在多个层面产生相关联的知识。

三、自主研究

自主研究是创造知识的主要路径。从事知识创造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如了解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研究方法、具有观察能力、拥有自主思维能力等。显而易见，自主思维能力较弱的人难以创造新知识。从创造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的角度看，知识创造者需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

进行自主的学术选择。事实上，对于创造理论知识而言，能否自主地进行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要进行自主知识创新，研究者需要具备自主选择的能力和自主选择的权力。自主选择的能力意味着研究者具有创造新知识的知识基础，自主选择的权力则意味着研究者能自行决定研究的目的、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这两者都关系研究者创造出新知识的概率。

首先，在本体论维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长期存在着结构-施动者之争，争论内容之一就是国际行为体到底是国家还是决策者个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需要就行为体是什么进行选择，即确立是以决策者为行为体，还是以国家作为行为体。决策者是人，国家是组织机构，其区别不仅在于分析层次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人为生物，而国家为非生物。前者有自主行为意识，后者则没有自主意识。若以决策者为行为体，所创造的知识必然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而选择国家为行为体，所创造的知识则可能将国家行为视为物质环境驱动的被动结果。中国、印度、欧洲的古代思想家们都将统治者视为国际行为体，很少有人将国家这一组织机构视为行为体的。如今，人们在分析二战起因时会提及希特勒，谈到建立联合国体系时会提到罗斯福，讨论冷战的开启会提到丘吉尔，分析冷战的结束会提及戈尔巴乔夫，而说起当下的逆全球化则要提到特朗普。国际体系层面的重大变化是决策者导致的还是国家引发的，这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若要创新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研究者就需要在本体论上做出自主选择。此外，分析当下美伊战争的发生原因，也同样面临着行为主体的选择问题：是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还是特朗普发动的这场战争？冷战后，拜登、奥巴马、小布什和克林顿主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其在伊核问题上都选择了谈判策略，而特朗普二次执政后不久就对伊朗发动了战争。

其次，从认识论维度看，国际关系研究者需要在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之间进行选择。一元论将国际关系现象的变化归因于单一自变量：或观念因素或物质因素，或主观因素或客观因素，或内因或外因，或决策者或社会环境。二元论则将上述每对要素结合起来，认为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否认任何一方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作用。多元论则认为，所有国际关系现象的发生与变化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认为每个因素都只是必要条件，它们的组合才构成充分条件。然而，由于国际关系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构，单一变量解释肯定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多变量解释虽更接近客观世界，但却难以厘清国际关系现象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双变量解释是对单一变量和多变量解释的折中，牺牲一些真实性以换取解释的深刻性。研究者需要根据其研究的

具体问题，在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之间进行选择。三种认识论各有千秋，因此，研究者需要有自主选择的能力和条件。

再次，方法论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经常要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如归纳法与演绎法、形式逻辑分析与辩证逻辑分析、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众所周知，研究方法是工具，因此，研究者可以采取多种不同方法分别应对研究中的不同问题。在多种情况下，研究者并不缺乏自主选择研究方法的权力，而是不具备使用研究方法的能力，即研究者无法使用其不掌握的方法。一般而言，掌握较多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他们创造新知识的概率要高于掌握较少研究方法的学者。因此，在方法论层面，建设知识体系的重点是要提高研究者使用先进研究方法的能力。例如，如果将中国核武器的知识视为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一就是科技和工程人员掌握了建造核武器的方法。这意味着，从掌握创造理论知识的具体方法入手，学者们可以提高知识创造的自主性。

结 语

“自主知识体系”的内部构成要素是多元且相关联的，因此，本文对“自主”“知识”和“体系”三者关系的讨论结论可归结为：应坚持自主的方向、创造出具体知识，进而形成知识体系。故此，中国学者应通过自主创造知识达到建成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国际关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可考虑从结构主义范式向决策者范式转变。希望学界同仁对作者的管窥之见予以批评指正，在坚持自主的基础上，同时也希望此文能促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创造具体知识，至少能促进学界对这项建设的多样化认识，减少大同小异的 AI 式认识。

FOREIGN AFFAIRS REVIEW

Bimonthly Volume 43 Number 3 2026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AO Fei SU Changhe LI Xiangyang YAN Xuotong

Editor's Note: On May 17, 2016, President Xi Jinping delivered an important speech at the Symposium on the Work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alling for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2022, during his inspection tour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ident Xi further emphasized that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ltimately boils down to building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China's IR academic community bears a heavy responsibility and a lofty mission to further advance innovation in knowledg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within the discipline. For decades, Western IR theories have been rooted in the diplomatic practice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the modern West, making them inadequate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the vast “Global South”, including China. Meanwhile,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major-country diplomacy has unfolded along a grand and historic course, featuring multifaceted practices and yielding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Yet, overshadowed by the paradigms, discourses,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Western IR theories, China's experie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tic practices has long remained in a state of theoretical disempowerment, making it difficult to refine and elevate such practices into an independent theoretical system. China's extensive, distinctive, and multifaceted diplomatic practices provide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IR. Meanwhile, a practice-oriented approach also serves as crucial guidance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China's IR studies. To further advance this endeavor and better address the questions of China, the world, the people, and our times, this journal has invited four renowned scholars to engage in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theme of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aim is to deepen the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elucid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From Pursuing Superiority to Accepting a Balance of Power: Maritime Multipolarity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U. S. Maritime Strategy

HU Bo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pursuit of global maritime superiority and sea control became the cornerstone of U. S. maritime strategy and a foundational element of its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grand strategy. However, since 2021, the U. S. has increasingly embraced the concepts of maritime balance of power and sea denial. Driven by a structural reversal in global maritime power dynamics, a dramatic shift in the balance of maritime power, and deepening domestic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 S., U. S. maritime strategy is undoubtedly undergoing a historic restructuring, shifting from a pursuit of superiority to an acceptance of a balance of power. To this end, the U. S. will offload greater responsibility and costs to its allies, develop more cost-effective flexible response strategies, rely more heavily on underwater and unmanned systems, and seek to revitalize maritime infrastructure and manufacturing, while significantly scaling back its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for global maritime security. Its objective is to sustain a balance of power favorable to the U. S. in strategically vital sea areas and deny adversaries the capability to conduct major military operations. For both the U. S. and the world, this restructuring represents a disruptive strategic shift that is destined to be a long-term process. While policy vacillations and tactical reversals are inevitable, the long-term trend has been set, and the direction of U. S. future maritime strategic planning is unlikely to be fundamentally reversed. In the long run, this restructuring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global maritime strategic stability and eas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short term, however, it may exacerbate the instability in hotspot waters and prompt the U. S. to act with greater disregard for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der.

Key words: U. S. maritime strategy, multipolarity, balance of power, sea control, sea denial, strategic retrenchment

Great-Power Competition over the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Ports as Sea Power Pivots: A Case Study on the Smart Ports Rival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A Yunfei Mao Weizhun

Abstract: In-depth globalization has driven sea power competition into an era of strategic maritime governance centered on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 States that secure dominance over supply chains can translate economic strength into strategic advantages, geopolitical resilience, and the capacity to shape